

外事翻译 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Affairs*

涂和平 张欲晓 江广华 刘彦娟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外事翻译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Affairs

涂和平 张欲晓 江广华 刘彦娟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事翻译理论与实践/涂和平等著.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118-05701-0

I. 外... II. 涂... III. 英语 - 翻译理论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9726 号

※

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 $\frac{1}{8}$ 字数 234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010)68428422

发行邮购:(010)68414474

发行传真:(010)68411535

发行业务:(010)68472764

前 言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是沟通各族人民的思想,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手段。它是一种难度较大的双语艺术,是集语法、修辞、逻辑、文化知识的综合运用于一体的,不但要把原著的字句翻译出来,更重要的是要把它的思想、精神传达出来,还要尽可能地表现出作者写作的特殊风格。只有融会贯通,中西兼顾,才能产生好的译文。翻译活动的范围很广,种类很多。按其翻译材料来分,有科技材料的翻译,文学作品的翻译,政论作品的翻译,外事材料的翻译及其他应用文的翻译。本书着重研究和探讨外事材料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外事翻译主要是在各种外交、外事场合,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是奉命代表自己的国家向对方传达国家和政府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方针政策,外事翻译的特殊目的决定了外事翻译的特殊性。在外事翻译实践中要特别注重翻译的政治性、时代性、准确性和灵活性。为了正确地传达思想,译者在斟酌词句时要特别注意它的政治色彩,在翻译时要掌握本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要熟悉和了解政治与文化背景,细心揣摩字里行间的真实含义和政治倾向。同时,还要不断学习了解最新方针、政策,与时俱进,以便准确翻译。在外事翻译时往往涉及到一些国家的历史和往事,在翻译有关历史事件或时过境迁的事情时,译者应注重翻译的时代性。经济全球化,使世界正在发生举世瞩目的变化与发展。外事词汇也

反映着人们日新月异变化着的现实生活、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与人类文明的不断提高。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变化促使人们寻求新的表达方式以反映新的现实情况。这些层出不穷的新词往往在外事活动、新闻报道中最先使用。这些词语有的是旧词转义,有的是新词新意,有的是临时新造词,因此在翻译时应与时俱进,切实表达原文作者的意思。任何一种民族语,书面语言也好,口语也好,都与该国政治制度中的思想概念、历史及名人名言密切联系,因而译者需了解英、美等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教育体系、历史事件、宗教信仰及民风民俗,洞悉英语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内容。缺乏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了解就无法准确地表达原文作者的真实含义,在外事翻译中,特别是在口译时英语习语和汉语习语之间意思完全对等的很少,其中多数是不同程度的对应。有许多英语习语,在翻译时往往找不到相对应的汉语习语,而某些非习语的英语短句或句子却常常可译成汉语习语;反之亦然。因此,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可不必过于拘泥于形式,充分发挥语言的灵活性,使译文更加生动有力。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参考了国内外许多同行专家和学者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专著和书籍,从中选用了一些练习材料和讲解例句,在此一并致谢。

外事翻译材料丰富多样,源远流长,远非一本书所能包罗。本书只是一种尝试,借此抛砖引玉。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读者和同行专家不吝指正。

作者

目 录

| 第一部分 外事翻译理论篇 |

第一章	中国外事翻译史简介	3
第二章	外事翻译标准及其特点	10
第三章	外事翻译者必备的素质	18

| 第二部分 外事翻译技巧篇 |

第四章	外事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	25
第五章	习语的翻译	32
第六章	委婉语、缩略语的译法	48
第七章	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译法	61
第八章	外事翻译中的机构、组织译法	66
第九章	外事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	76
第十章	外事翻译中隐喻的翻译	81
第十一章	外事实用文体的翻译	89
第十二章	长句的译法	98
第十三章	名词性从句的翻译	113
第十四章	定语从句的译法	117
第十五章	状语从句的译法	129

| 第三部分 外事文本翻译实践篇 |

第十六章	关于国际法的阐释汉英语言比较	137
第十七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汉英语 言比较	144

第十八章	江泽民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汉英语言比较	151
第十九章	布什总统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汉英语言比较	156
第二十章	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上的讲话汉英语言比较	177
第二十一章	布什总统在白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汉英语言比较	182
第二十二章	克林顿总统就职演说汉英语言比较	188
第二十三章	约瑟夫永恒的人类价值观念汉英语言比较	202
第二十四章	外事政治概念译法阐释	215
第二十五章	外事经济概念译法阐释	226
第二十六章	外事资料翻译实践	237
附录一	外事翻译中的专题词	264
附录二	汉英外交政治词汇	267
附录三	奥运词汇	271
附录四	常见的借喻词和提喻词	273
参考文献		277

第一部分

外事翻译理论篇

第一章 中国外事翻译史简介

第一节 世界外事翻译史简述

深圳大学副教授谭载喜在《西方翻译简史》一书中写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两个原始部落间的过细,从势不两立到相互友善,无不有赖于语言和思想的交流,有赖于相互理解,有赖于翻译。《圣经创世纪》中记述的以色列人约瑟兄弟旅居埃及,公元前 449 年希腊和波斯签订卡里阿斯和约,古罗马帝国为其军队招募日尔曼士兵,也无疑都要依靠翻译的作用。”

也有学者认为世界的翻译史,始于公元前 3 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翻译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据此看来,人类翻译活动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有很多翻译理论家就翻译理论进行了探讨:罗马帝国时期翻译理论家西塞罗提出的直译与意译的两分法;中世纪波伊提乌的直译论、但丁的“文学不可以”论、多雷的翻译五原则;17 世纪至 19 世纪巴托的“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论,德莱顿的“直译、意译、批译”三分法,等等。这些理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倾向,即文学翻译理论和语言翻译理论。前者强调翻译的重点是进行再创造。后者从语言的使用技巧、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于语意上的对等寻求产生一种与原文予以对等的译文,强调翻译学和语义学有密切联系,也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有关。翻译既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有创造性,也不都是仅仅传递信息。究竟什么时

候应该侧重哪一方面,要看什么翻译,或翻译什么。

就内容而言,翻译主要包括宗教、文化、经贸等诸多方面。随着不同国家和文化间交流的开展,外事翻译也逐渐成为翻译活动中的重要内容。法国外交家皮埃尔——米歇尔·埃泽基认为:“自有国际关系便有外交,可以说,一个民族愿同邻近民族接触之日为外交诞生之时。”从词源上讲,外交一词与外出有关。diplomacy 是希腊语 diploma 的派生词,意为“一折为二”:两块折合连接一起的金属片的护照、通牒和其他文件。从广义上来说,外交是随着部落、民族、国家的产生,以及不同部落、民族、国家之间开始进行交往而诞生的。有了外交,就需要翻译,外事翻译应运而生。

18 世纪以前,欧洲外交界使用的是拉丁文。当时的外交文书、外交对话、条约起草都使用拉丁文。中国在与其他国家交往时也使用拉丁文。例如:1689 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用拉丁文起草的。为此,中国代表团启用了两名耶稣会的外国传教士为随员,参与条约文本的草拟工作。19 世纪中叶以后,法语逐步代替拉丁文而成为通用外交语言。这与法国在当时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及法语语法结构严谨、表达准确有关。20 世纪以来,英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逐步成为较为通用的外交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与法语平分秋色,并驾齐驱。1919 年凡尔赛和约把英、法文本共同作为正式文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在外交应用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几乎全世界通用。但在正式外交交涉和谈判中,各国仍使用本国语言。因此,在外交中,翻译必不可少。外事翻译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职业。

第二节 中国外事翻译史简述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开展了和别国的外交活动,因而外事翻译也有悠久的历史。谭载喜在《西方翻译简史》一书中提到:“孔子周游列国,在各地言语发音不尽相同,彼此交

流甚少的当时,也不可不通过‘象寄之才’(即翻译人员)以‘达其意,通其欲’。”

我国很早便开始了外事口译活动,从汉代杰出外交家张骞和班超先后三次出使西域,到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至南洋和印度洋),翻译在这些对外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与亚洲、欧洲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汉朝末年,我国以佛教翻译为主的笔译工作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翻译高潮,历时近千年。随着之后西方文化的逐渐传入我国,我国又出现了以翻译西欧国家科学文化为主的第二次翻译高潮。

公元四五世纪,我国与欧、亚地区国家的贸易往来有较大发展,翻译(当时主要是口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明朝初,在长达2000年的时期里,中国对外关系活跃,且一直处于主动地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间我国出现了两次翻译高潮。明代郑和下西洋,使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快速发展。

从清代后期起,中国国力逐渐衰败,以致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外交翻译也遭受了100多年的耻辱。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官员办外交,由于找不到本国的翻译,而不得不长期启用外国人担当翻译。1861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后改名为外务部。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掌管外交的机关。当时顾维钧担任外交总长的秘书和参事。他建立了翻译室,负责翻译外文报纸中有关我国的报道,以便及时了解中国事务在外国的反应。从那时起,翻译室始终是外交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862年以后,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昌等地建立了国文馆、法文馆、俄文馆等,开始培养外交、翻译人才。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先后向美国、英国、法国派遣留学生,通过办学堂和派留学生等方式,培养了一批翻译和科技人才。他们翻译和出版了许

多介绍国外情况的书籍。他们当中有些人为清朝官员当外事翻译。譬如,直隶总督李鸿章掌管外事务时,启用从法国留学回国的马建忠担任外交谈判翻译。但总的说来,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不论使用外国人当总理衙门的最高顾问(如英国人赫德,总理衙门处理各种国际问题都征求他的意见,甚至请他办理外交),还是用外国人当外事翻译(如英国人托马斯、怀特和法国人马尔丹等),这些外国人担任中国外交翻译都不同程度地给清政府的外交谈判增添了不利因素。

更有甚者,中国派往欧、美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的大臣竟是外国人。1867年,清政府决定遣使出国。恭亲王奕訢奏报称:“顾中国出使外国……语言文字,尚未通晓,仍须倚翻译,未免为难;况为守兼优,才堪未队者,本难起选。”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乘机毛遂自荐。蒲安臣实际上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指示后才提出的。1865年12月15日,他回华盛顿述职时,国务卿西华德指示他建议满清政府将他遣使赴美。接到指示后,蒲安臣返回中国,去总理衙门辞行。根据当时做翻译的丁韪良的记忆:“蒲安臣声明,愿意就列强误解中国的问题为中国说话。”恭亲王表示:“我们很愿意派你充任我们的使节。”同时,清政府又决定委派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为“左协理”,海关税务司法国人德善为“右协理”。1868年2月,蒲安臣终于靠施展狡猾手段,充任了满清政府派往欧美各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的“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蒲安臣在1867年1月14日给西华德的报告中称:“我缜密地考虑这问题,并且和朋友商量后,决定为美国的利益,接受这一任务。”这是中国100多年屈辱外交的写照。它从反面说明政府拥有自己外交翻译人才的重要意义。

20世纪初,翻译工作极其活跃。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及大量苏、美、日、欧的名著被译成中文。这对中国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外事翻译事业不断发展。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就着手为新中国培养外事翻译和外交人才。

20 世纪 40 年代,中央军委在延安开办了外国语学校。周恩来在对外国语学校师生讲话时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新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需要许多人从事外交工作。为了迎接胜利,外语学校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而且应加速培养外交人才。1948 年,为迎接全国解放,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华北解放区创立外事学校。1949 年 6 月,中央决定将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与外事学校合并为北京外国语学校。这些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外交干部和外事翻译。

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毛泽东主席“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割断同旧中国半殖民地屈辱外交、卖国外交的联系,创立独立自主的新外交,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兴外交关系。在建设外交队伍方面,则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绝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的具体指示,创建一支新型的外交队伍,包括新型的外事翻译队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坚持在对外交往中使用自己的翻译。这是我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体现和保证。

建国初期,延安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学校等外语学校培养出一些外语人才,原中央外事组一些懂外语的干部转到外交部,又从文科大学选了一些毕业生,组成新中国第一批外交人员和翻译人员。因懂外文的外交和翻译人才短缺,外交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大抓培养工作:将北京外国语学校扩大,并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外交学院;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把干部学习外语列为外交部和驻外使馆的重要任务之一。

上述措施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外交官和外交翻译。但随着我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国际地位提高,同我建交、半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加,翻译力量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1957 年,我国与几个国家建交,但派不出懂驻在国语言的翻译。那年年底,周总理指示外交部拟定一个培养翻译干部的十年计划,“必须配齐所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语文的翻译”;“第一批是培养俄语、

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印尼语等语种的翻译干部。培养地点可考虑以外语学院为中心,国家出经费聘请所需的专家和教授,培养计划请外交部商量有关方面,拟好后于一月四日报送上来”。外交部根据总理指示,同有关部委和学院制定了十年内培养 35 个语种 452 名高级翻译的计划。1958 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设了翻译班。1959 年 3 月,总理又指示外交部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 1000 名初级翻译。近 1500 名高、初级外交翻译培养计划的付诸实施,使翻译力量大大增强,初步解决了外语人才短缺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我国外交,也干扰和破坏了外交翻译的培养和外交翻译工作。70 年代初,我国同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先后建交,同美国打开关系,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外交工作的大发展又对外交翻译提出了新要求。1971 年,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从外语院校毕业生和留学生中选调一批翻译人才进外交部工作。1973 年,我国恢复向国外派遣外语留学生。这批同志学成回国后,在外交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自 1978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根据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调整外交政策,外交工作异常活跃,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外交翻译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外交部翻译室工作量的大幅度增加就说明了这一变化。70 年代,中国礼宾制度尚未实行改革,每逢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必邀请所有外国驻华使节参加欢迎宴会、招待会、答谢宴会等,宾主在这些场合的讲话往往需要译成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翻译室当时虽然只有几十个能讲英、法、俄、西、阿拉伯文翻译,但也能够满足工作需要。而且,每个语种只需一两个主要翻译就可以完成我国国家领导人的主要外事活动的口译任务。现在礼宾制度改革后,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时,不再邀请所有驻华使节参加所有的正式宴请活动,只请来访国的使节和有关人士参加。在这种双边活动中,宾主双方也不发表长篇演讲,最多即席讲几句。这就不需要事先翻好讲话稿。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对

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外交活动极其频繁,今天外交工作的发展使得口、笔译的工作量翻了好几番。外交部翻译室在口、笔译方面都承受着很大的工作压力,口、笔译人员经常处于短缺状况。外交事业及外事翻译事业的发展,要求加紧培养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翻译人员。

第二章 外事翻译标准及其特点

第一节 翻译的标准

翻译标准(Criteria of translation)是语际间翻译的规范性制约条件,是检验、衡量和评价翻译质量、价值和功能的标尺,同时也是指导翻译实践的准则。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选择、确立及界定翻译标准中的具体准则,一直是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活动实践者争论不息的话题。

近代翻译家严复于1898年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首次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即忠实于原著,笔译流畅,文字典雅。他说:“译事有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仅仅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关于正确处理“信”、“达”、“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曾在我国引起一场关于翻译问题的大讨论。我国当代文学大师郭沫若和茅盾,十分推崇“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郭沫若说:“三条件不仅缺一不可,而且是在信达之外,越雅越好。”茅盾晚年在自己的译文集的序言中对信达雅的内涵提出自己的界说:“信即忠于原文;达即译文能使别人看懂;雅即译文要有文采。一句话,既不能‘顾其义而忘其神’又不可‘得其神而忘其体’。”鲁迅则认为翻译应该以信为主,有时可以“宁信而不顺”。此外,也有人不赞同“雅”的标准,认为不能脱离原文片面求雅。原文本身不雅,怎么可能要求译文古雅?不过,“信达雅”中的“信”和“达”一直影响到现在人们看待翻译的标准。